

從「二七部隊」看臺灣原住民的
二二八事件參與*

陳慧先

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本文探討二二八事件期間，「二七部隊」活動範圍周邊，臺灣原住民參與事件的情形，試圖釐清當時臺中地區為何會有「霧社『番族』馳援」的傳聞，以及「二七部隊」成員選擇向「霧社」原住民求援的原因。並透過口述訪談，提出過去較少注意到的部落視角，呈現事件期間原住民族動態更多的樣貌。

臺中地區的「二七部隊」在二二八事件期間採取抵抗路線，被認為是避免臺中市區遭受無差別屠殺的主因。官方情報顯示二二八事件期間約有百餘名原住民參與臺中市區的騷動——部分消息來源甚至特別說明來自「霧社」。本研究指出，此傳聞應是誤認來自埔里能高區署的「埔里隊」，原因有三：其一，「埔里隊」進入臺中市區時間，與「二七部隊」部隊長鍾逸人第一次向霧社求援時間點接近；其二，「埔里隊」成員有不少平埔族，在外觀上誤認；其三，確有來自霧社或清流部落的族人捲入事件。

「二七部隊」要角第一時間選擇向霧社原住民求援，除地理空間距離考量，「霧社事件」歷史記憶應是影響因素——舊臺共成員自霧社事件後即有爭取臺灣原住民合作與支持的想法。「二七部隊」請求族人響應未果，但霧社地區族人並不全然置身事外，出身霧社與遷至川中島的賽德克族人，均有族人捲入二二八事件，有以個人身分主動參加者、也有被動遭波及的。此外，亦有來自各地、當時在臺中求學的族人，直接參與或受事件影響。

關鍵字：二七部隊、臺灣原住民、霧社、謝雪紅、高聰義、廖德聰

壹、前言

發生在 1947 年的二二八事件，影響戰後臺灣歷史發展甚為深遠，近三十年多來，隨著檔案徵集、開放與學者專家們的研究，人們對於二二八事件有更多機會識得更完整面貌。¹不過，時至今日一般社會大眾對於二二八事件的刻板印象，仍多半停留在「本省」、「漢人」的二二八，似與臺灣原住民族群無涉。

透過先行研究者如范燕秋（1958-2021）、吳叡人、陳中禹等學者的研究，讓我們對二二八事件中原住民族的參與，特別是以林瑞昌（1899-1954，樂信·瓦旦，日野三郎）與高一生（1908-1954，Uyongu Yata'uyungana，矢多一生）為中心，以及事件期間原住民族整體動態有更清晰的瞭解。²1992 年 2 月 22 日行政院版《「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正式公開，同年 2 月 26 至 28 日范燕秋〈淪亡於二二八的原住民英靈〉一文在《自由時報》連載，是國內最早有關泰雅族菁英林瑞昌的研究，該文篇幅雖不長，但已點明林瑞昌在二二八事件中的態度與立場。³

約略同一時期，解嚴後的臺灣文學界，多部以二二八事件為背景、題材

* 本文初稿曾以〈臺灣原住民與「二七部隊」〉為題，於 2021 年 2 月 25 日國史館臺灣文獻館主辦「原住民族與二二八學術研討會」發表，後收錄於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原住民族與二二八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21 年），頁 41-61（無審查）。此版本修改原標題、調整論文架構，刪改增補內容並新增數則史料與口述訪談。期間承蒙研討會評論人蘇瑞鏘教授提供寶貴建議、高英傑先生指引相關資訊，期刊論文匿名審查人斧正，特此致謝。

1 1991 年 1 月 17 日「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成立，1992 年 2 月 22 日提出正式報告即「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此外，1990 年代初期由政府機關陸續出版的檔案資料包括：1991-1994 年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出版的《二二八事件文獻輯錄》等三冊、1992-1997 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的《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等六冊，以及國史館於 1997 年出版《國史館藏二二八檔案史料》等三冊。參見賴澤涵，〈序二〉，收錄於賴澤涵總主筆，《「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臺北：時報文化，1994 年），頁 6-7；張炎憲，〈緒論〉，收錄於侯坤宏，許進發編，《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一）——立法院檔案、國家安全局檔案》（臺北：國史館，2002 年），頁 2。

2 如：范燕秋，〈樂信·瓦旦與二二八事件中泰雅族的動態——探尋戰後初期臺灣原住民菁英的政治實踐〉，收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編，《二二八事件 60 週年紀念論文集》（臺北：臺北市文化局，2008 年），頁 365-391；吳叡人，〈「臺灣高山族殺人事件」——高一生、湯守仁、林瑞昌事件之政治史的初步重建〉，收於《二二八事件 60 週年紀念論文集》（臺北：臺北市政府文化局·臺北二二八紀念館，2008 年），頁 325-363；陳中禹，〈二二八事件中原住民族動態與形象轉變〉，發表於「新史料與二二八研究學術研討會」（2013 年 11 月 29 日至 30 日），頁 1-29。

3 范燕秋，〈淪亡於二二八的原住民英靈〉，《自由時報》（1992 年 2 月 26 日），第 4 頁。

的長篇小說陸續出版，包括林耀德（1962-1996）的《一九四七高砂百合》（1990）、鍾肇政（1925-2020）的《怒濤》（1993）、李喬（1934-）的《埋冤一九四七埋冤》（1995）等。⁴ 值得注意的是，林耀德與李喬的小說中都提及霧社的原住民——「賽德克族」。⁵

李喬與林耀德兩部小說，分別以兩種不同立場呈現二二八事件期間原住民的參與，卻又不約而同地提及「霧社」。⁶ 李喬正式落筆前已在 1977-1979 年間訪問「二七部隊部隊長」鍾逸人（1921-），並陸續訪問涉入二二八事件、死於白色恐怖政治案件鄒族湯守仁（1924-1954）的親人，與見證二二八事件的相關人士，李喬的小說《埋冤一九四七埋冤》內容貼緊史實，並以文學虛構貫穿，⁷ 小說中描繪阿里山鄒族（書中作曹族）與霧社賽德克族（書中作泰雅族賽達克亞族）在二二八事件中的身影。

林耀德的《一九四七高砂百合》，則以霧社的泰雅族人（即賽德克族）瓦濤·拜揚祖孫一系貫穿全書。林耀德以「複調小說」書寫形式，描述霧社族人並存於二二八事件前一天的生命經驗，隱含二二八事件與臺灣原住民無涉的意味——在小說的第十二章，霧社族人古威·洛羅根只是以旁觀者的角色，在臺北市延平北路目睹二二七緝菸事件，而未加入群眾的行動。⁸ 林耀德筆下以旁觀者立場置身二二八事件之外的霧社族人，除作者本身刻意地選

4 林耀德的《一九四七高砂百合》於 1990 年 1 月至 7 月間在《臺灣春秋》16 期至 22 期連載，李喬的「埋冤、一九四七」於 1989 年冬起稿，1990 年 3 月 6 日至 8 月 28 日先在《首都早報》連載，後因《首都早報》歇業，12 月 28 日後移至《臺灣時報》副刊連載，1991 年 11 月 7 日截止。參見李喬，《埋冤一九四七埋冤（下）》（苗栗：李喬，2003 年 2 月 3 版），頁 643。

5 賽德克族於 2008 年 4 月 23 日始正名，林耀德書中使用的是「霧社的泰雅族」，李喬則是使用「泰雅族賽達克亞族」。另外，鍾肇政的《怒濤》亦提及原住民在二二八事件的參與，其描繪的是新竹一帶北部山區的情形。鍾肇政，《怒濤》（臺北：草根，1997 年），頁 291-292。

6 《一九四七高砂百合》第一章林以簡單的幾句話題及霧社事件：「將近二十年前的昭和五年。泰雅族部落最後一次和日本人的抗爭……確切地說，十六個秋天之前的昭和五年，或者平地漢人所謂的霧社事件，這些紀元和歷史名詞對於大自然和瓦濤·拜揚兩者而言都不具備絲毫的意義。」林耀德，《一九四七高砂百合》（臺北：聯合文學，2006 年二版一刷），頁 23-24。

7 參見李喬，《埋冤一九四七埋冤（上）》，頁 299；李喬，《埋冤一九四七埋冤（下）》，頁 644。

8 參見鄭恆雄，〈林耀德《1947 高砂百合》的歷史神話符號系統〉，《中外文學》26:8（1998 年 1 月），頁 124；詹宜穎，〈論李喬《埋冤一九四七埋冤》與林耀德《一九四七高砂百合》中「日本」的書寫及其意義〉，《人文社會科學研究》11:1（2017 年 3 月），頁 83。

擇安排，⁹也反映當時一般大眾對二二八事件中原住民動態的想像。¹⁰

李喬書寫「泰雅族賽達克亞族」顯然和「二七部隊」與霧社原住民的接觸有關。二二八事件期間，積極作為者採取的方式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是以民意代表或地方仕紳為主，採協商會議路線，扮演政府與群眾間的折衝，二是採取武力對抗形式，中部的「二七部隊」即屬後者。因應陸軍整編二十一師進逼中臺灣，「二七部隊」轉往埔里，此舉將國軍引入山區，由於其尚未可知的實力讓國軍有所忌憚，被認為是避免臺中市區遭受無差別屠殺的主因。1980年代中葉以降，陸續有多部回憶錄與口述訪談提及「二七部隊」，¹¹近年來始有以「二七部隊」作為主題的學術研究。¹²「二七部隊」相關口述訪談中屢屢出現原住民的身影，不過目前為止針對「二七部隊」與原住民族關係的討論並不多。

過去已有研究點出二二八事件期間臺中地區有一、兩百名原住民涉入騷動的情報與傳聞。¹³究竟為何事件期間，臺中地區會出現霧社「番族」馳援傳聞？「二七部隊」部分成員又是基於那些理由選擇向「霧社」原住民求

9 朱宥勳，〈中心凹陷的歷史？——林耀德《一九四七高砂百合》的歷史與敘事結構〉，《文訊》339（2014年1月），頁90。

10 1990年代初期至今，陸續有更多小說作品以二二八事件為背景，幾部長篇小說直接或間接地提及在臺中地區的「二七部隊」，如李昂《自傳的小說》（2000年）、陳玉慧《海神家族》（2004年）、姚嘉文《霧社人止關》（2011年）、邱立崑與閃靈樂團《戰後五七八天》（2014年）等。其中2010年以後出版的《霧社人止關》與《戰後五七八天》，對比過去大多數的二二八小說，對於臺灣原住民在事件中的角色已有更深刻與詳盡的描繪。參見陳澄州，〈戰後臺灣歷史小說中的二七部隊〉，收錄於李喬等撰，楊翠主編，《青春二二八：二七部隊的抵抗、挫折與流轉》（臺北：二二八基金會，2017年），頁73-102。

11 如：鍾逸人，《辛酸六十年：二二八事件二七部隊隊長鍾逸人回憶錄》（臺北：自由時代，1988年）、古瑞雲，《臺中的風雷》（臺北：人間出版社，1990年）、黃金島，《二二八戰士：黃金島的一生》（臺北：前衛，2004年）、楊克煌，《我的回憶》（新北：楊翠華，2005年）、李娜整理編輯，《無悔——陳明忠回憶錄》（臺北：人間出版，2015年二版）等。

12 楊翠主編的《青春二二八：二七部隊的抵抗、挫折與流轉》一書中，收錄多篇以「二七部隊」為主題的學術論文，如：蘇瑞鏘討論二七部隊中的人物與二二八事件後的政治選擇、林瓊華探討謝雪紅離開二七部隊的歷史問題，以及陳澄州論述戰後歷史小說中的二七部隊等。

13 陳中禹，〈二二八事件中原住民族動態與形象轉變〉，頁7-8。筆者過去研究亦曾略提及二七部隊的埔里隊、推估隊伍中原住民參與人數，但尚未提出相關史料進一步佐證，此外重點放在二七部隊成員向霧社求援過程，沒能釐清當時為何指向霧社，且缺乏部落族人的聲音。參見陳慧先，《原漢分治下的人群隔離與跨界（1930-1960s）》（臺北：南天，2020年），頁174-175，頁182-187。

援？本文希望透過目前所能掌握的二二八事件相關檔案、報章資料與口述訪談等，針對過去未解的疑惑，尋求可能的答案。此外，擴及「二七部隊」活動範圍周邊各原住民族在二二八事件中的參與，並提出過去較少注意到的部落視角，呈現事件期間原住民族動態更多樣貌。

貳、「二七部隊」與霧社「番族」馳援傳聞

1947 年 2 月 27 日，發生於臺北市天馬茶房外的查緝私菸事件，點燃民眾對於戰後初期政府在臺施政的不滿，而後騷動擴散全島。透過廣播等媒介，臺中地區民眾在短時間內即接獲臺北騷動訊息，3 月 1 日楊逵（1906-1985）、鍾逸人等印發傳單、倡議隔日（2 日）於臺中戲院（日治時期的臺中座）召開市民大會，會中謝雪紅（1901-1970）被群眾推舉為市民大會主席。會後民眾群起騷動，引發武裝衝突。官方對外宣傳國軍即將鎮壓臺中市區，試圖威嚇群眾，結果適得其反，激起民眾保衛家鄉之情，並於教化會館成立「中部地區治安委員會作戰本部」。¹⁴

當時臺中地區的青年與中等學校學生自發組成治安隊，包括：「獨立治安隊」、「臺中師範隊」、「臺中一中隊」、「建國工藝學生隊」等，此外還有來自埔里的「埔里隊」，3 月 3 日臺中市黨、政、軍、憲機構被攻克。為團結力量與方便調度，1947 年 3 月 6 日，¹⁵ 決議將各隊集中至前日本陸軍干城營區統一指揮，人數約四百餘名，這支隊伍被稱作「二七部隊」，命名由來是紀念 2 月 27 日臺灣同胞被屠殺的日子。¹⁶ 3 月 12 日國軍進逼臺中，為避免波及無辜，「二七部隊」撤往埔里，15 日傍晚謝雪紅與楊克煌（1908-1978）等離開埔里，16 日警備隊長黃金島（1926-2019）率三十餘名

14 古瑞雲，《臺中的風雷》，頁 51-53；楊克煌，《我的回憶》，頁 295。

15 根據鍾逸人的說法「二七部隊」成立時間則是在 1947 年 3 月 4 日。參見鍾逸人，《辛酸六十年（上）》（臺北：前衛，1997 年增訂版第三刷），頁 554。

16 黃金島著，《二二八戰士：黃金島的一生》，頁 100；古瑞雲，《臺中的風雷》，頁 53。；鍾逸人，《辛酸六十年（上）》，頁 480。

學生駐守烏牛欄吊橋（位於今南投縣埔里鎮愛蘭里），迎戰廿一師，戰況激烈，即「烏牛欄之役」，但因雙方兵力懸殊，民軍孤立無援，傍晚隊伍解散，分組逃亡，結束中部地區的武力抗爭。¹⁷

「二七部隊」不論是成員人數、軍備武器、存在時間等，均非一般正規軍的規模，其組織鬆散，與各個時代反抗暴政義軍形勢無異。也因為「二七部隊」是由下而上發起，事後綜觀各當事人所述相關資訊，或因記憶差異、或因所處位置不同稍有出入。¹⁸ 無論如何，二二八事件期間，臺中市區之所以沒有遭受無差別屠殺，「二七部隊」的存在應是關鍵——其未知的武力使國軍有所忌憚，並將軍隊引往埔里與南投山區。¹⁹

二二八事件期間，官方已獲報有原住民涉入中部的騷動：

臺中暴動即欲接收七五供應站倉庫，經該站抵制未遂，竟藉稱學生被國軍圍殺，走請高山蕃族二百餘馳援，均日式攜軍武器趕到，該站兵力不足，終江夜被洗劫，軍火損失甚鉅。聞高山尚匿有日軍二百餘人伺機作亂，臺中叛徒聞嘉義、高雄暴動不得手，即唆蕃族二隊往助。²⁰

此外，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調查室函送的二二八事變相關資料提及：

三月三日……霧社有番族二百餘人，攜有軍刀圖向臺中騷擾，轉又退回山間。²¹

17 參見楊克煌，《我的回憶》，頁 319；黃金島著，《二二八戰士：黃金島的一生》，頁 103-133。

18 參見林瓊華，〈背叛與沉冤的辯證：關於謝雪紅離開二七部隊的歷史問題〉，收錄於李喬等撰，楊翠主編，《青春二二八：二七部隊的抵抗、挫折與流轉》（臺北：二二八基金會，2017），頁 38-39。蘇瑞鏘，〈二七部隊人物初探——以二二八事件後的政治抉擇為中心〉，收錄於李喬等撰，楊翠主編，《青春二二八：二七部隊的抵抗、挫折與流轉》，頁 109。

19 李喬，〈二七部隊與臺中人挺身反抗的歷史意義〉，收錄於李喬等撰，楊翠主編，《青春二二八：二七部隊的抵抗、挫折與流轉》（臺北：二二八基金會，2017），頁 6。

20 侯坤宏，許進發編，〈國家安全局檔案——張秉承上言普誠代電呈報臺中叛亂情形並言及高山族馳援乙事（民國 3 年 3 月 20 日）〉，《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一）——立法院檔案、國家安全局檔案》，頁 363。

21 侯坤宏，許進發編，〈國家安全局檔案——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調查室致言普誠代電函送二二八事變相關資料，附件（二）：臺灣暴動經過情報撮要（民國 36 年 2 月 28 日至 3 月 10 日）〉，《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一）——立法院檔案、國家安全局檔案》，頁 92。

1947 年 3 月 6 日《臺灣新生報》亦刊載有相關內容：

【本報訊】茲彙誌臺中連日情況如下：……至三日晨〔，〕青年及學生、消防等組織保安隊、救護隊負擔市內治安維持秩序……治安人員之糧食，由市內有志捐出，女學生總動員，從事炊飯。同時有霧社高山同胞百餘人聞訊下山協助服務……。²²

以上的資訊均指出在 1947 年 3 月 3 日，有一百至兩百餘名原住民進入臺中市區支援，部分消息更進一步說明——這批原住民來自「霧社」。²³

1988-1991 年間，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訪問中部地區二二八事件見證者，多位受訪者亦提及此事，然說法並不一致。有和官方情資、報刊所載相同的說法：「謝雪紅領導煽動，且召集霧社山胞百餘人，於臺中市舉行示威遊行。」²⁴，也有持反對意見者指出：「事件中山地先住民並無下山，但霧社治安委員會顏金龍、黃土寬等人則被國軍二十一師逮捕。」²⁵ 那麼當時狀況究竟為何？是否有原住民進入臺中市區？霧社的賽德克族人又是否參與其中？

根據實際參與「二七部隊」的當事人，鍾逸人、黃金島、陳明忠（1929-2019）、古瑞雲（1925-2001）與楊克煌等人的口述回憶，提供不少原住民族人參與二二八事件的資訊。相關內容大致可分成兩類，一是實際參與或捲入臺中市區行動的原住民；二是赴霧社交涉期間接觸的族人。有關族人在臺中地區參與部分，楊克煌回憶與謝雪紅二二八事件期間經歷時提到，1947 年 3 月 4 日曾有兩名嘉義來的高山族青年前往作戰本部請求支援武器，

22 〈臺中市連日情況 市區秩序已恢復〉，《臺灣新生報》（1947 年 3 月 6 日），第二版。

23 在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新聞室編的《臺灣暴動事件紀實》收錄一份由劉季園致警察大隊警員劉天沂之報告，敘述自臺北至臺中參加反抗行動，其中提及「會同高山族及在八仙山知日本人（係潛伏者）共千餘名，向臺中市舊部第八部隊的兵營襲擊」。所述恐有誇大，但亦呈現二七部隊成立前原住民參與臺中反抗行動的蹤跡。參見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新聞室編，《臺灣暴動事件紀實》（1947 年 4 月），頁 26。感謝匿名審查人提供相關資訊。

24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二二八事件文獻輯錄》（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 年初版第二次印行），頁 109。

25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二二八事件文獻輯錄》，頁 116。

以及「埔里隊」中高山族戰士的戰鬥精神與嚴格規律令人感動。²⁶鍾逸人敘及「埔里隊」與其領隊黃信卿，²⁷多次提到其中的幾位「山地青年」，²⁸陳明忠等人的回憶錄裡均提及該隊伍成員的英勇善戰。²⁹「埔里隊」是3月3日攻下臺中教化會館時的主力，部分成員在該隊撤回埔里後，繼續留在臺中，加入日後各隊會集後成立的「二七部隊」。

比對官方情資、新聞報導，以及時人回憶，透過日期與相關描述，當時各方傳聞提及的「霧社番族百餘人」，極可能是指來自埔里的隊伍。二二八事件的訊息傳抵中部後，埔里民眾立即響應臺中的行動，曾組織「黑衣隊」與「埔里隊」，前者因接收日本警察冬季黑色制服而命名，成員約30人，由童榮宗擔任隊長，曾至臺中協助「民軍」進攻第八部隊；後者則由黃信卿所組織並擔任隊長，該隊亦曾至臺中市，協助「民軍」抵抗國軍。³⁰在鍾逸人等的回憶與口述中，埔里隊與黑衣隊似為同一隊伍，名稱依其出發地或成員裝束描述而有差異。1947年3月4日「埔里隊」奉命撤回時，30多名原埔里隊隊員隨童榮宗返回，黃信卿則與其他六、七位山地青年留下。³¹

出身埔里的巫先生對「黑衣隊」有以下口述回憶：

埔里地區自南洋回臺軍人所組成的「黑衫部隊」，大約有三、四十人，擁有分局之武器，曾下山攻打國軍部隊，為區長廖德聰（臺中市人）所支持，惟二、三天後即返回埔里，並主動解散。³²

26 楊克煌，《我的回憶》，頁298-303

27 黃信卿（1922-1981），宜蘭冬山人，日本早稻田大學政經科畢業。曾任日本關東軍陸軍上尉，因於臺北密組「臺灣青年黨」，遭官方通緝逃匿至埔里外婆家，聽聞當時臺北發生動亂，遂組織「埔里隊」，並擔任隊長。參見鍾逸人，《辛酸六十年（上）》，頁472。

28 鍾逸人，《辛酸六十年（上）》，頁479、501。

29 李娜口述整理，《無悔——陳明忠回憶錄》，頁79。

30 賴澤涵總主筆，《「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頁100。

31 鍾逸人，《辛酸六十年（上）》，頁471-473、478-479、481。另外，曾參與二七部隊烏牛欄之役的黃炳松則提及，當時在臺中市的中國軍，稱呼這支來自埔里的民軍叫「黑部隊」。參見林偉盛、陳儀深、廖建超訪問，林偉盛、彭孟濤、廖建超記錄，《南投二二八口述歷史訪談錄》（臺北：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2019年），頁281。感謝審查人提供相關資訊。

32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二二八事件文獻輯錄》，頁116。

內容與鍾逸人的回憶大致吻合。鍾提及能高區署區長廖德聰（1891-1962）曾表明已派人赴臺中救援，³³ 但一日後隨即要求隊伍撤回，原因是不希望派往臺中協防的隊伍成為鬥爭工具，³⁴ 日期與若干情節都與前述官方情報所提「三月三日……霧社有番族二百餘人，攜有軍刀圖向臺中騷擾，轉又退回山間」一致。「埔里隊」進入臺中市區的時間，與後來任「二七部隊」部隊長鍾逸人第一次向霧社求援的時間點接近，加上「埔里隊」成員有不少平埔族，³⁵ 在外觀上誤認，很可能是外界將來自埔里的隊伍，誤以為是霧社族人的原因。「二七部隊」部隊長鍾逸人曾三度前往霧社求援，分別在 1947 年的 3 月 3 日、3 月 7 日與 3 月 15 日，³⁶ 3 月 3 日鍾逸人第一次前往霧社途中，與趕往臺中市區的「埔里隊」巧遇，由於時間相近，不知情者或許因此將「埔里隊」誤以為是來自霧社的族人。

至於能高區署區長廖德聰在其中扮演怎樣的角色？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典藏的臺中西屯廖家文書，有一份廖德聰在 1947 年 5 月 17 日上呈官方的陳情書內容，敘及二二八事件期間埔里鎮的情形。對此廖德聰本人的說法是：埔里青年於 3 月 2 日透過廣播與電話得知臺中情形，即欲前往臺中援助，但被廖勸阻，隔日又有一批少年躍躍欲試，加上臺中治安本部亦傳訊求援，廖終不能阻止，故由黃信卿率三十餘名青年赴臺中，廖在陳情書中特別補充說明：「但不給錢不給糧」。³⁷ 就廖所述是在勸阻無效的情況下讓青年們赴臺中，這份陳情書應是當時上呈給官方的副本，廖是否因此對於自己在事件中的主動性避重就輕？3 月 12 日「二七部隊」撤往埔里，向能高

33 廖德聰（1891-1962），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乙科畢業，日治時期曾任教於西大墩公學校，受聘板橋林家、霧峰林家，參與「一新會」活動，戰後曾任臺中縣大屯區西屯鄉鄉長、能高區署區長，二二八事件後離開公職。參見廖繼思，〈臺灣士紳廖德聰的履歷書〉，《臺灣風物》61：2（2011 年 6 月），頁 9-29。

34 鍾逸人，《辛酸六十年（上）》，頁 471-473、478-479、481。

35 李娜口述整理，《無悔——陳明忠回憶錄》，頁 81。

36 參見鍾逸人，《辛酸六十年（上）》，頁 468、513、575。

37 「民國 36 年 5 月 17 日廖德聰立陳情書及信函等資料」（T0863_02_02_0009），2021 年 5 月 4 日調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史檔案資源系統：<https://reurl.cc/ynd8mD>。

區署要求接收武器庫，廖德聰一方面以區署行政首長身分拒絕，另一方面又暗示：「當然破壞大鎖搶走又另當別論」，或可推敲廖德聰在二二八事件期間的肆應與心境。³⁸

1947年3月12日「二七部隊」撤往埔里前，還有其他零星原住民族人，參與或涉入臺中市區的騷動。可以查證個人身分背景的原住民族人有：高菊花（矢多喜久子，1932-2016）、汪玉蘭（山中光子）、方美英（田原秀子）、莊野秋（野田好秋）、劉佳彬等人，其中鄒族的高菊花、汪玉蘭、方美英當時是臺灣省立臺中師範學校簡易師範科的學生，莊野秋亦為鄒族族人；³⁹ 劉佳彬為原住民，隨「埔里隊」入臺中，二戰期間有實際作戰經驗，可能是霧社地區的賽德克族人。⁴⁰ 此外曾有兩名嘉義來的高山族青年前往二七部隊作戰本部請求支援武器。⁴¹ 「二七部隊」成員多為青年與中、高等學校學生，如：臺灣省立臺中師範學校、臺灣省立臺中第一中學、臺灣省立臺中商業職業學校與臺灣省立農學院等，當時在臺中求學的中、南部地區原住民青年學子，因而捲入其中。

國家安全局檔案「臺中縣能高區南投區二二八『暴徒』調查表」中有數位「參與暴動」者來自仁愛鄉法治村、大同村與親愛村，亦可見布農、泰雅族人參與其中。⁴² 能高區署區長廖德聰的陳情書亦提及，1947年3月3日，即有部分山地青年受煽動欲下山參與暴動，在他與仁愛鄉鄉長高聰義順勢引導下，將下山的原住民青年留在埔里，協助保衛當地的外省人，最多有

38 廖繼思，〈臺灣士紳廖德聰的履歷書〉，頁26。

39 蘇瑞鏘，〈二七部隊人物初探——以二二八事件後的政治抉擇為中心〉，頁112、114、128、130。鍾逸人，〈辛酸六十年（上）〉，頁556-557。

40 參見鍾逸人，〈辛酸六十年（上）〉，頁514、517-520。不過，鍾逸人在〈從二七部隊到政治黑牢〉一文中，對劉佳彬的描述是：「東埔山青，從菲島回來的前日本陸軍軍曹」，東埔部落（今南投縣信義鄉東埔村）所屬族群以布農族為主，其真實身分還有待查考。鍾逸人，〈從二七部隊到政治黑牢〉，收錄於向陽主編，《打破暗暝見天光》（新北：國家人權博物館，2016年），頁70。

41 楊克煌，〈我的回憶〉，頁298。

42 〈臺中縣能高區南投區二二八之臺人調查表〉，收錄於侯坤宏、許進發編，《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一）——立法院、國家安全局檔案》，頁480、482-483。

七十三名，在留下所需人數後，3 月 8 日後陸續將山地青年送回部落，並給予煙酒、食糖等慰勞。⁴³顯示除有明確資料佐證實際參與「二七部隊」相關活動者外，在「二七部隊」活動範圍周邊，捲入二二八事件的原住民亦頗有一些。

叁、為何指向「霧社」？

二二八事件時就讀臺灣省立員林農業職業學校的學生林昭南（1931-）提到當時在霧社所見情形：

二月二十七日本校（員林農校）體育老師謝三雄（本省籍）陪同童軍教官吳立厚（外省籍）前往埔里參觀山地同胞生活習俗。二月二十八日那天，他們還留在埔里；因為山胞被謝雪紅煽動，所以霧社一帶的山胞，看到外省人就抓起來，吳老師因為是外省人所以被抓……三月四日，謝三雄老師臨時召集學生隊，指示……將從學校出發前往埔里、霧社解救童軍教官……（三月六日）上午六時……行抵能高區署時，因見有山胞守衛，乃提出區署證明，另開當地小車上霧社營救吳老師，最後圓滿達成任務……根據吳老師表示，有人被山胞活埋，因其本人從事教育工作未遇害，但亦瘦得不成人形。⁴⁴

二二八事件期間員林區區長林糊（1894-1973）與員林農校校長，商洽員林農校高年級學生維持地方治安，期間學生隊協助營救在霧社受困的童軍教官，透露當時遠離臺中市區的霧社在二二八事件前期亦有騷動。⁴⁵

為什麼官方情報與事件初期的報導，將參與臺中市區騷動的原住民，認

43 「民國 36 年 5 月 17 日廖德聰立陳情書及信函等資料」（T0863_02_02_0009）。

44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二二八事件文獻輯錄》，頁 120。

45 參見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二二八事件文獻輯錄》，頁 120、508。

作是來自霧社的族人？根據前述推測可能與「二七部隊」成員曾試圖聯繫霧社族人協助有關，「二七部隊」部隊長鍾逸人曾三度前往霧社求援，謝雪紅也曾在3月14日帶領隊員前往霧社與族人聯繫。⁴⁶那麼「二七部隊」成員又為何選擇向「霧社」求援呢？如果只是想尋求「有作戰經驗的山地青年」⁴⁷，未必要選擇前往霧社。

一、空間距離與地緣關係

筆者曾請教鍾逸人先生當初為何選擇尋求過去未曾往來的霧社族人加入，而非可能較易取得信任的阿里山鄒族族人（鍾自述二二八事件前曾兼任吳鳳鄉樂野國小校長）？⁴⁸鍾先生第一時間的答覆是：「那時候西螺大橋還沒蓋好吧？」⁴⁹言下之意，在當時的交通條件下，搭乘軍用卡車前往霧社，比至阿里山容易且距離近得多。

據說「二七部隊」在成立之初已擬好對策，若遭國軍反撲，將往埔里與竹山方向撤退。⁵⁰「二七部隊」撤退至埔里後，成員們對於未來走向看法有二，一是固守埔里，二是繼續往霧社撤退。⁵¹

鍾逸人三度赴霧社遊說結果並不順利。一是因為距當時十多年前「霧社事件」的經驗，還讓老一輩的族人餘悸猶存，即便同情理解者，也僅同意讓年輕人以個人身份加入協助。其次陳儀政府的施政在二二八事件前後尚未明顯影響山地社會——然而，至1949年5月，霧社街物價也明顯出現大幅波

46 楊克煌，《我的回憶》，頁314；古瑞雲，《臺中的風雷》，頁70-71。

47 鍾逸人，《辛酸六十年（上）》，頁468。

48 詢問於2017年3月18日臺中市新文化協會舉辦之「『二七部隊』紀錄片放映暨座談會」會後，地點：二二八國家紀念館。

49 西螺大橋於1953年1月28日正式通車，是跨越濁水溪連接彰化與雲林間西部縱貫公路的重要通道，其落成前一般民眾需搭乘火車或渡河工具，才能克服濁水溪的阻隔。參見「臺灣大百科全書：西螺大橋條目」：<https://reurl.cc/Xe4QA0>（2021年1月29日瀏覽）。

50 古瑞雲，《臺中的風雷》，頁54。

51 黃金島著，潘彥蓉，周維朋整理，《二二八戰士：黃金島的一生》，頁106-107。

動。⁵²再者部落對於「紅色」共產黨的疑懼，⁵³均是「二七部隊」無法取得奧援的原因。

二、「霧社事件」歷史記憶的影響

如果「霧社事件」的歷史記憶，是影響賽德克族人參與、協助「二七部隊」意願的原因，反過來說，「霧社事件」歷史記憶是否促成「二七部隊」成員前往霧社求援？——雖然霧社事件起事六社遺族早已被日人由霧社遷往川中島（今仁愛鄉互助村清流部落）。

霧社起事六社以總數僅三百餘人的壯丁，抵禦裝備精良的日本軍、警近三千人，長達近三個月之久，霧社族人的驍勇善戰與霧社易守難攻的地理環境，讓外界印象深刻。包括日後軍務局對於謝雪紅等人退往埔里山中的情資，也提及此事：「緣是地在日人時代僅一彈丸之地之霧社反抗，日軍進剿費時三月尚未能平定，最後使用毒氣使行剿除……。」⁵⁴官方對於謝雪紅與二七部隊可能退往霧社一事，聯想到1930年的「霧社事件」，因而頗為忌憚。

1947年3月14日謝雪紅帶領數人前往霧社與族人聯繫，⁵⁵謝原先打算將隊伍撤往霧社深山，為取得族人支持或至少爭取理解，故先行前往霧社。⁵⁶時任仁愛鄉鄉長的高聰義（1920-？；Pakishan Nao，日名加藤直一），拒絕謝雪紅的請求。⁵⁷理由是霧社地區族人，在霧社事件期間已死傷大半，倖存的孩童成年後又因投入高砂義勇隊折損甚多，雖同情二七部隊的遭遇，但婉拒部隊撤往霧社，也不贊成動員霧社地區族人參與二七部隊的武裝抗爭，僅

52 俞昌琮，《陌生的一家人》（臺北：稻鄉，2011年），頁181。

53 鍾逸人，《辛酸六十年（上）》，頁513、517-519、頁575-576。

54 國史館，〈臺灣二二八事件(1)〉，「臺人逃入埔里山中與企圖擴大事態情形。」（民國36年04月23日），檔號：A202000000A/0035/2212002.58/1/0001/021（2021年9月14日瀏覽）。

55 楊克煌，《我的回憶》，頁314；古瑞雲，《臺中的風雷》，頁70-71。

56 古瑞雲，《臺中的風雷》，頁70-71。不過，黃金島等人對於撤往霧社一事並不表樂觀，表示：「自二二八事件以來，固然有不少山胞投入參與，但如果整個二七部隊進入霧社，因語言上的隔閡，及生活習慣的不同，整個部隊與當地民眾是否能融洽相處，獲得山胞充分信任，仍存有不確定因素……」參見黃金島著，潘彥蓉，周維朋整理，《二二八戰士：黃金島的一生》，頁107。

57 能高區警察所的偵查報告，也回報謝雪紅在1947年3月在埔里開會時主張聯絡高砂族等發言，並與仁愛鄉長高聰義會面情形，惟開會與會面日期指為3月底與3月17日與其他口訪資料有出入。參見〈能高區警察所張基梵偵查謝雪紅三月底在埔里開會情形之報告（36.05.01）〉，收錄於林正慧編，《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十九）——臺中縣政府檔案》（臺北：國史館，2017年），頁264-265。

表示若有族人以個人名義加入，將採取開放態度不予反對。謝雪紅等人在 3 月 14 日前往霧社，據說當晚有十多名霧社青年下山參戰，在戰鬥中表現勇猛。⁵⁸

高聰義是布農族人，出生於霧社，埔里小學校、霧社農業講習所畢業，1941 年進入臺北帝國大學附屬農林專門部進修，1943 年 7 月自願加入第七回「高砂義勇隊」，二二八事件期間時任仁愛鄉鄉長。⁵⁹ 高聰義與吳鳳鄉長高一生，是少數幾位在二二八事件發生當下，沒有參加位於臺北的「臺灣省訓練團」⁶⁰ 活動的山地鄉鄉長。

二二八事件期間，全臺 30 位山地鄉鄉長中有 23 位正於「省訓團」進行「民政系鄉鎮長第一期甲班（山地鄉）」集訓，原訂訓練時間為 1947 年 1 月 8 日至 4 月 8 日，因二二八事件爆發，主辦單位以成員「均係民選，負地方維持責任，特別是高山同學均係各該山地鄉鎮頭目，深恐各該地無人率領，發生動亂」，提前於 3 月 4 日結訓，讓各地鄉鎮長迅速返回原鄉。⁶¹ 高聰義在前一年（1946）已於「民政系山地行政組第一期」受訓結業，分發任臺中縣仁愛鄉公所副鄉長，後當選由鄉民代表會選舉出的仁愛鄉長（委任選舉），可能因此未再參加。⁶² 1947 年 5 月臺中縣政府以仁愛鄉長高聰義、副

58 李娜口述整理《無悔——陳明忠回憶錄》，頁 86-87；古瑞雲，《臺中的風雷》，頁 70-71。

59 參見蔡慧玉訪問，吳玲青記錄〈高聰義先生訪問紀錄〉，收錄於蔡慧玉編著，吳玲青整理，《走過兩個時代的人：臺籍日本兵》，頁 321、325-326。

60 臺灣省訓練團的前身為「臺灣省地方行政幹部訓練團」，1946 年 8 月 1 日起改隸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由行政長官兼團主任。此次訓練的學員，由長官公署民政廳就當時現任各縣市鄉鎮長調訓。參見《臺灣省訓練團團刊》第 2 卷第 1 期（1946 年 9 月 1 日），頁 207、第 3 卷第 8 期（1947 年 3 月 2 日），頁 312-313。收錄於侯坤宏、楊蓮福，《民眾經典：民間私藏民國時期暨戰後臺灣資料彙編（政治篇）第三冊：臺灣省訓團團刊》（臺北：博揚文化，2011 年）。當時未到訓的山地鄉長包括：吳鳳鄉長高一生、霧台鄉長盧媽達、金山鄉長李世雄、紅頭嶼鄉長謝萬慶。參見〈電各縣市政府為延未到訓鄉鎮長應予處分，希遵辦具報〉，《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公報》36：春：26（1947 年 2 月 1 日），頁 407-408。

61 參見《臺灣省訓練團團刊》第 4 卷第 1 期（1947 年 4 月 6 日），頁 574、第 4 卷第 5 期（1947 年 6 月 1 日），頁 650-651、頁 654。

62 「民政系山地行政組第一期」學員於 1946 年 11 月 8 日結業（共受訓 3 個月），根據《臺灣省訓練團團刊》所載，高聰義結業後被派任為仁愛鄉副鄉長，參見《臺灣省訓練團團刊》第 2 卷第 8 期（1946 年 12 月 8 日），頁 325。1946 年 11 月 15 日，高聰義當選由鄉民代表會選舉出的仁愛鄉長，並於同年 11 月 30 日宣誓就職，參見臺中縣政府編，《臺中縣政府三十五年度工作報告表》（臺中：臺中縣政府，1946 年），頁 14-15、35。不過，高聰義曾於口述訪談中自述：1946 年 7 月起任被選派為第一、二任官派仁愛鄉長，第三任後才由代表會代表間接選舉，其間矛盾有待查考。參見蔡慧玉訪問，吳玲青記錄，〈高聰義先生訪問紀錄〉，收錄於蔡慧玉編著，吳玲青整理，《走過兩個時代的人：臺籍日本兵》，頁 283。

鄉長劉錦坤保護內地同胞深明大義，霧社員警、警手于事變時防範周密、應變得宜，派能高區署查明仁愛鄉長高聰義、副鄉長劉錦坤、霧社派出所員警等有功人員事蹟以憑核獎。⁶³

1930 年霧社事件爆發時，臺灣共產黨的改革同盟一派，視「霧社事件」為臺灣革命高峰期來臨的前兆，主張以臺灣共產黨的名義發表聲明、散發傳單，支持霧社武裝起事。不過，當時同為臺共成員的謝雪紅並不同意，理由是「臺灣共產黨剛剛建立，基礎還沒打好，而且為數不多的黨員大多缺乏戰鬥經驗。在這種條件下，公開聲援霧社起義，必然會受到毀滅性的打擊破壞。」當時的謝雪紅因不贊成 1928 年甫成立的臺灣共產黨公開聲援霧社事件被批評「右傾機會主義」。⁶⁴

臺共成員翁澤生等人，在霧社事件發生後曾數度向共產國際報告相關情資——包括 1930 年 10 月霧社事件，與 1931 年 4 月第二次霧社事件的始末與局勢分析，以及臺灣原住民在日本帝國主義下遭受的壓迫與剝削。⁶⁵ 1930 年共黨成員在討論中已論及原住民運動議題，預計著手事項包括：（1）選擇適當同志學習原住民語言，協助推展原住民工作（2）在原住民間成立與黨聯繫與合作的革命政黨（3）向原住民群眾深入說明黨的民族綱領，根據這個民族綱領，原住民擁有自決權利。⁶⁶

日後共產國際給臺灣共產主義者的信中也提到：

63 〈臺中縣政府奉電令能高、東勢區署翔實查明此次變亂中該區信義鄉柯桂枝、仁愛鄉長高聰義、副鄉長劉錦坤、霧社派出所員警等有功人員事蹟以憑核獎（36.05.16）〉，收錄於林正慧編，《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十九）——臺中縣政府檔案》，頁 165。

64 古瑞雲，《臺中的風雷》，頁 139-140。另參見陳芳明，《謝雪紅評傳》（臺北：麥田，2017 年），頁 176-177。

65 〈第 3 號文件・文章「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的臺灣」（1930 年）〉、〈第 16 號文件・翁澤生關於臺灣情勢的報告（1931 年 1 月 13 日）〉、〈第 58 號文件・翁澤生關於霧社事件的第二份報告（1931 年 5 月 10 日）〉，收錄於郭杰、白安娜著，李隨安、陳進盛譯，《臺灣共產主義運動與共產國際（1924-1932）研究・檔案》（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0 年），頁 273、頁 367-368、頁 502-503。

66 〈第 27 號文件・瞿秋白與翁澤生、潘欽信及陳德興的談話紀錄（1930 年 10 月）〉，收錄於郭杰、白安娜著，李隨安、陳進盛譯，《臺灣共產主義運動與共產國際（1924-1932）研究・檔案》，頁 397。

共產主義者之間存在一種低估原住民（所謂「土著」）在民族革命運動中的角色、以及對於必須與原住民組織反日本帝國統一戰線無知的傾向。他們未曾努力接近這些在臺灣最受壓迫的人民，……直到現在，他們的戰鬥仍是孤立的……想要與原住民合作、以革命信念教育他們、或是將他們組織、吸引到反日本帝國主義的革命戰鬥共同陣線並不是件容易的事。不過，我們必須認清原住民在霧社革命事件中對臺灣人所展現的一項友善信號（他們殺的全是日本人，而不殺臺灣人）。……共產黨應該準備訓練特別的同志，並將他們派遣到山區……。⁶⁷

均可見在 1930 年霧社事件後，左翼人士對臺灣原住民的關注，以及與之聯繫合作的企圖。

1930 年反對臺灣共產黨公開聲援霧社事件的謝雪紅，在 1947 年選擇至霧社求援，1930 年代關於霧社事件的經驗與記憶或為遠因。謝雪紅至霧社遊說原日混血的下山一（林光明，1914-1994）兄弟的說詞是：

國民政府的軍警官吏，貪贓枉法不守紀律，只會欺壓善良百姓。
你們泰雅族最英勇擅戰，深明大義地引發過震驚國際的霧社事件。
現在臺灣人正團結一致在和國民黨軍抗戰。你倆兄弟實在應該發揮影響力，發動高砂族響應，共同推翻國民政府。⁶⁸

謝以「泰雅族」人善於作戰與當年震驚國際的霧社事件，勸說下山兄弟一同響應。下山一拒絕謝了雪紅的請求，但日後仍被密報窩藏謝一行人，情治單位甚至懷疑二七部隊臺中師範的學生軍是由下山一所策動，直到確認謝雪紅等人已逃亡中國，下山一才獲釋。⁶⁹ 由此也可看到謝雪紅對於聯合臺灣原住民族一事前後態度的轉變。

67 〈第 67 號文件・共產國際致臺灣共產主義者的第二封信的草案（1932 年 9 月）〉，收錄於郭杰、白安娜著，李隨安、陳進盛譯，《臺灣共產主義運動與共產國際（1924-1932）研究・檔案》，頁 528。

68 下山一（林光明）自述，下山操子（林香蘭）譯，《流轉家族：泰雅公主媽媽日本警察爸爸和我的故事》（臺北：遠流，2011 年），頁 297-298。

69 下山一（林光明）自述，下山操子（林香蘭）譯，《流轉家族：泰雅公主媽媽日本警察爸爸和我的故事》，頁 298-299。

1947 年謝雪紅、楊克煌、古瑞雲與蘇新等臺灣左翼人士，因二二八事件逃亡上海，後來在中共上海局指示下轉往香港，同年 11 月 12 日宣布成立「臺灣民主自治同盟」，在其綱領草案（共 18 條）中，明確的將「高山族人民一律平等，並得組織自治單位」列入其中。⁷⁰ 可以看到左翼人士，特別是謝雪紅，在經歷 1930 年霧社事件與 1947 年二二八事件後，對於爭取臺灣原住民合作與支持，更為積極的態度。

肆、「部落」視角

過去多半透過檔案、報紙，或「二七部隊」參與者的口述回憶，⁷¹ 得知有零星的霧社族人以個人身分，參與在臺中地區的二二八事件，較少看到由原住民方本身談及在事件中的參與。根據賽德克族人口述，顯示確實有族人參與二二八事件，或受事件影響波及。

以眉溪部落（Alang Tongan，南投縣仁愛鄉南豐村）為例，事件期間至少有三位族人至埔里「參加」二二八，分別是 Walis Sapu（1925-？）、Awi Putah（1930-，游光華）、Biyu。Walis Sapu 戰後考取警察，二二八事件時在埔里，族人表示曾見到 Walis Sapu 於埔里分局前站崗值勤，事件後卻失蹤，族人推測可能因參與二二八事件亡故。⁷² Biyu 曾至埔里參與二二八事件，當時埔里分局發給參加者每人一支步槍，不過他後來把步槍留在愛蘭，開戰前即回到部落，未實際參戰。⁷³ Pering Toda（1930-）則透露，自己與其他幾位族人原本也打算加入在埔里的戰事，後因熟識的平埔族親友以「學生全部都

70 林瓊華撰稿，〈臺灣民主自治同盟綱領草案（1947.11.12）〉，收錄於陳君愷主編，《迢迢民主路上的自由呼聲——臺灣民主改革文獻選集》（臺北：中正紀念堂，2018 年），頁 128-129。

71 如鍾逸人、陳明忠等人的口述回憶。

72 簡鴻模，依婉・貝林合著，《眉溪部落生命史》（臺北：永望文化出版，中華民國臺灣原住民同舟協會，2002 年），頁 149、324。

73 簡鴻模，依婉・貝林合著，《眉溪部落生命史》，頁 119、149、324、453-454。

在埔里集合了，一定會打起來」等語勸阻，才改變心意。⁷⁴此外，亦有部落族人曾聽聞有關謝雪紅事後逃亡的路徑與經過。⁷⁵

出身清流部落、亦曾任仁愛鄉長的桂敏彥（1914-1992，Puhuk Walis，日名牧野敏彥），戰後初期在埔里擔任警察，二二八事件爆發後，父親擔心他的安危，一度要求他搬回部落。⁷⁶上述族人事發當下多數人在埔里，受事件影響時間推測是在 1947 年 3 月 12 日「二七部隊」撤往埔里後，部分族人甚至是在 3 月 3 日即隨「埔里隊」進入臺中市區，鍾逸人回憶中所提之劉佳彬即為一例。

另一方面，部分族人則是因為當時正就讀臺中師範學校簡易師範科，而被捲入二二八事件。清流部落的 Pawan Tado（1931-1976，漢名高友利，霧社事件起事六社荷歌社（Gungu）頭目之子）與來自中原部落的賽德克族人，二二八事件期間即在臺中師範學校簡易師範科就讀，據說校方曾於事發時發給學生 384 步槍自衛，學生們隨「二七部隊」撤至埔里時亦攜回槍枝，事後警方徹查追究，是高永清（Pihu Walis，中山清，1914-1981）帶著就讀臺中師範學校的族人與槍械向官方自首，學生們才又回到學校繼續完成學業。⁷⁷此外，還包括同在臺中師範學校簡易師範科就讀的鄒族族人，例如時任吳鳳鄉鄉長高一生的女兒高菊花等。

不過，涉入其中者，是否就算「二七部隊」的一員呢？以高菊花為例，她本人並不認為自己有「參加」，當時只是跟著學校團體行動，照顧被集

74 Pering Toda 為曾任監察委員、立法委員與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主任委員的瓦歷斯·貝林之父。參見簡鴻模，依婉·貝林合著，《眉溪部落生命史》，頁 226-227、324。

75 Sapu Tema（1946-，白水河）口述：「二二八事件在愛蘭橋打完後，謝雪紅的逃亡路線是從埔里經霧社到合歡山繞梨山往臺中，再潛逃到大陸，當時合歡山的路車子不能開，只能用走路的」。參見簡鴻模，依婉·貝林合著，《眉溪部落生命史》，頁 324。

76 簡鴻模，依婉·貝林，郭明正合著，《清流部落生命史》（臺北：永望文化出版，中華民國臺灣原住民同舟協會，2002 年），頁 182。

77 陳慧先，〈Tado Nawi（高信昭）先生訪談紀錄〉，訪問時間：2021 年 11 月 1 日，地點：Tado Nawi 先生清流部落宅。

中在校內的俘虜而已。⁷⁸ 1993 年高菊花受訪時提到：「二二八的時候……莊野秋在臺中不知參加什麼」。鄒族的莊野秋，時年 17 歲，原本於臺北念書，二二八事件期間因騷動離開臺北前往臺中（他的未婚妻汪玉蘭當時在臺中）。⁷⁹ 高菊花提到隨「二七部隊」撤往埔里後，於竹崎遇一位太魯閣族人，該太魯閣族人二二八事件期間在臺中機場當兵，曾在機場看到莊野秋用武士刀砍阿兵哥。⁸⁰ 該太魯閣族人後隨高菊花一行人到阿里山，因路途遙遠無法越過中央山脈回到東部，便留在阿里山成為高家的幫傭。此人的日名為川口克己，漢名武忠誠，時年 19 歲。1947 年 3 月間，川口克己因於旗山區雅你鄉、恆春區獅子鄉散發矢多一生（高一生）、安井猛（安猛川）等人具名發出的「案內狀」遭高雄縣警察局扣押。⁸¹

附帶一提，二二八事件清鄉期間，鄒族的高一生與族人安井猛（1909-1989，漢名安猛川），曾於 1947 年 3 月 17 日發出的〈案內狀〉（通知書），召集臺灣原住民各族菁英在同年 4 月 10 日至「霧社」開會，商討高山自治事宜。⁸² 為何選擇「臺中縣霧社元分室」作為集合場所？是因為霧社位居臺灣中部，對來自各地的部落菁英而言，地理位置較其他山地鄉便利，抑或有其他的考量——作為原住民抵抗統治者的「霧社事件」發生地，具有特殊象

78 〈高一生〉，收錄於張炎憲等採訪記錄，《諸羅山城二二八》（臺北：吳三連基金會，1995 年），頁 156-157。

79 高英傑先生口述，2021 年 2 月 25 日於「原住民族與二二八」學術研討會，地點：國史館。

80 〈高一生〉，《諸羅山城二二八》，頁 156。

81 感謝高英傑先生提供資訊，指出該太魯閣族人即為川口克己，以及川口克己日後落腳阿里山的原委，根據高英傑先生的說法，原本在臺中機場當兵的川口是被以俘虜身分被帶走的。另參見侯坤宏、許進發編，〈臺灣省「二二八事變」曾經被捕或已釋放人犯名冊〉，《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二）——國家安全局檔案》（臺北：國史館，2002 年），頁 404；吳俊瑩，〈導言〉，收錄於吳俊瑩編，《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二十五）——高雄縣政府檔案（一）》（臺北：國史館，2020 年），頁 24-25。

82 〈南部綏靖區司令部 36.3.28 孟密綏字第〇一〇六號代電〉，收錄於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編，《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六）》（臺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1997 年），頁 686-689。另參見吳叡人，〈臺灣原住民自治主義的意識型態根源：樂信・瓦旦與吾雍・雅達烏猶卡那政治思想初探〉，收入洪麗完主編，《國家與原住民：亞太地區族群歷史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9 年），頁 210-211。

徵意義？此次集會後來在瑪雅鄉長林貴春勸阻下取消，⁸³ 散發通知書的川口克己等人，被高雄縣警察局逮捕。後高雄政府亦電知臺中縣政府嚴密防範「吳鳳鄉高山同胞被亂黨叛徒所煽動企圖暴動」。⁸⁴

前述〈案內狀〉附記中內容多少透露高一生對於被捲入二二八事件的心境：

應該是臺灣的原住民、主人翁的我等高山族，在數百年之間，雖然對政府常保忠實，平時卻被侮蔑為生蕃以及蕃人。儘管如此，一旦有必須訴諸武力的事情發生，就會突然被平地的野心家、革命家所煽動、關愛，被讚揚說山上的人是勇敢、正義的強者云云，結果不僅成為替平地人擋子彈的犧牲者，還因而被轉嫁以土匪罪名，受到討伐。⁸⁵

感受到被平地的野心家、革命家煽動，成為替平地人擋子彈的犧牲者。

伍、結論

二二八事件期間，官方情報顯示約有一百至兩百左右的原住民參與臺中市區的騷動——甚至特別指出來自「霧社」。比對官方情資、新聞報導與口述訪談，1947年3月3日，所謂「霧社有番族二百餘人，攜有軍刀圖向臺中騷擾」、「霧社高山同胞百餘人聞訊下山協助服務」，指的應該是來自

83 吳俊瑩，〈導言〉，收錄於吳俊瑩編，《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二十五）——高雄縣政府檔案（一）》，頁24-25。

84 〈高雄縣政府電知臺中縣政府據旗山區密報吳鳳鄉高山同胞被亂黨叛徒煽動企圖暴動請飭屬嚴密防範〉，收錄於林正慧編，《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十九）——臺中縣政府檔案》，頁401。

85 參見〈南部綏靖區司令部 36.3.28 孟密綏字第〇一〇六號代電〉，收錄於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編，《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六）》，頁690。譯文引自吳叡人，〈臺灣原住民自治主義的意識型態根源：樂信·瓦旦與吾雍·雅達烏猶卡那政治思想初探〉，收入洪麗完主編，《國家與原住民：亞太地區族群歷史研究》，頁212。

埔里能高區署的「埔里隊」，人數約在 30-50 人間。由於「埔里隊」成員，多由南洋回臺之臺籍日本兵組成，絕佳的作戰能力，可能使外界高估成員人數。至於為什麼會誤以為是來自霧社的原住民？其一，「埔里隊」進入臺中市區的時間，與後來任「二七部隊」部隊長鍾逸人第一次向霧社求援的時間點接近；其二，「埔里隊」成員有不少平埔族，在外觀上誤認；其三，「埔里隊」中的確有來自霧社族人——例如鍾逸人回憶錄中提及的劉佳彬為霧社族人，最初即是隨「埔里隊」進入臺中市區。

「二七部隊」要角謝雪紅、鍾逸人為何在第一時間選擇向霧社原住民求援，除地理空間距離、戰略考量外，「霧社事件」歷史記憶可能是影響因素之一。霧社族人以寡抗眾抵禦日本軍警近三個月之久，震驚國際。此外，舊臺共成員自「霧社事件」後積極爭取臺灣原住民合作與支持的想法，多少對謝雪紅產生影響。

「二七部隊」部隊長鍾逸人在二二八事件期間三度赴霧社遊說，結果雖不順利，但霧社地區族人也不全然旁觀。資料顯示，出身霧社地區眉溪部落與遷至川中島的賽德克族人，均有族人捲入二二八事件當中，有主動參加者、也有被動受波及的族人，其中多數人當時居住或任職於埔里。參與者主要涉入的時間，一是在 3 月 3 日隨「埔里隊」進入臺中，二是在 3 月 12 日「二七部隊」退入埔里後捲入。甚至霧社地區本身在當時也發生騷動，至霧社參訪的外省籍教官，一度被拘留受困。

從目前掌握的資料，族人們的肆應除如過去相關研究中指出：各族群選擇有別，同一族群中也呈現差異，不同年齡層的抉擇不盡相同，二二八事件期間原住民直接、間接參與「二七部隊」或「二七部隊」正式成立前的自發性組織，以年輕世代、個別身分加入者居多。此外，還有來自各地、當時在臺中求學的各族原住民青年學子參與或受二二八事件影響，例如當時就讀臺

中師範學校簡易師範科，出身清流部落與中原部落的賽德克青年學子，以及鄒族領袖高一生的女兒高菊花。後者曾協助照顧被集中在校內的俘虜，雖然她本人並不認為自己有「參加」，只是隨學校同學團體行動而已。

「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於 1991 年 1 月 17 日成立，三十多年來在國家機構與民間團體共同努力下，過去被視為禁忌的二二八事件，人們已有機會了解事件較完整的面貌，進而同情理解時人當下的選擇。二二八事件期間，部分臺灣原住民族人實際參與事件，也有選擇兩方不得罪，甚至有意識地與事件保持距離，然而在這起全島性的事件中，臺灣原住民事實上很難置身事外，終究不得不捲入其中。

筆者認識的賽德克長輩 Dakis Pawan（1954-2021，郭明正）老師，曾不只一次提起：「我們的霧社事件，就像你們的二二八」，指的是同樣因忍無可忍而起身抗暴，以及事件後內部長期噤聲。透過本文研究，可以發現這兩件臺灣歷史上的重大事件，除某些情境相似外，彼此之間亦有扣連。

參考書目

壹、檔案或檔案彙編

〈民國 36 年 5 月 17 日廖德聰立陳情書及信函等資料〉（T0863_02_02_0009），2021 年 5 月 4 日調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史檔案資源系統：<https://reurl.cc/ynd8mD>。

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編，《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六）》。臺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1997 年。

吳俊瑩編，《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二十五）——高雄縣政府檔案（一）》（臺北：國史館，2020 年。

林正慧編，《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十九）——臺中縣政府檔案》（臺北：國史館，2017 年。

侯坤宏、許進發編，《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一）——立法院檔案、國家安全局檔案》。臺北：國史館，2002 年。

侯坤宏、許進發編，《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二）——國家安全局檔案》。臺北：國史館，2002 年。

侯坤宏、楊蓮福，《民眾經典：民間私藏民國時期暨戰後臺灣資料彙編（政治篇）第三冊：臺灣省訓團團刊》。臺北：博揚文化，2011 年。

國史館，〈臺灣二二八事件(I)〉，「臺人逃入埔里山中與企圖擴大事態情形年。」（民國 36 年 04 月 23 日），檔號：A202000000A/0035/2212002.58/1/0001/021（2021 年 9 月 14 日瀏覽）。

臺中縣政府編，《臺中縣政府三十五年度工作報告表》。臺中：臺中縣政府，1946 年。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二二八事件文獻輯錄》。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年。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新聞室編，《臺灣暴動事件紀實》。1947年4月。

貳、專書

下山一（林光明）自述，下山操子（林香蘭）譯，《流轉家族：泰雅公主媽媽日本警察爸爸和我的故事》。臺北：遠流，2011年。

古瑞雲，《臺中的風雷》。臺北：人間出版社，1990年。

向陽主編，《打破暗暝見天光》。新北：國家人權博物館，2016年。

李娜整理編輯，《無悔：陳明忠回憶錄》。臺北：人間出版，2014年；2015年二版一刷。

李喬，《埋冤一九四七埋冤》。苗栗：李喬，2003年。

林偉盛、陳儀深、廖建超訪問，林偉盛、彭孟濤、廖建超記錄，《南投二二八口述歷史訪談錄》。臺北：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2019年。

林耀德，《一九四七高砂百合》。臺北：聯合文學，2006年二版一刷年。

俞昌琮，《陌生的一家人》。臺北：稻鄉，2011年。

張炎憲等採訪記錄，《諸羅山城二二八》。臺北：吳三連基金會，1995年。

郭杰、白安娜著，李隨安、陳進盛譯，《臺灣共產主義運動與共產國際（1924-1932）研究·檔案》。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0年。

陳君愷主編，《迢迢民主路上的自由呼聲——臺灣民主改革文獻選集》。臺北：中正紀念堂，2018年。

陳芳明，《謝雪紅評傳》。臺北：麥田，2017 年。

陳慧先，《原漢分治下的人群隔離與跨界（1930-1960s）》。臺北：南天，2020 年。

黃金島，《二二八戰士：黃金島的一生》。臺北：前衛，2004 年。

楊克煌，《我的回憶》。新北：楊翠華，2005 年。

蔡慧玉編著，吳玲青整理，《走過兩個時代的人：臺籍日本兵》。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8 年再版。

賴澤涵總主筆，《「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臺北：時報，1994 年。

鍾逸人，《辛酸六十年（上）》。臺北：前衛，1997 年增訂版第三刷。

鍾逸人，《辛酸六十年：二二八事件二七部隊部隊長鍾逸人回憶錄》。臺北：自由時代，1988 年。

鍾肇政，《怒濤》。臺北：草根，1997 年。

簡鴻模，依婉·貝林，郭明正合著，《清流部落生命史》。臺北：永望文化出版，中華民國臺灣原住民同舟協會，2002 年。

簡鴻模，依婉·貝林合著，《眉溪部落生命史》。臺北：永望文化出版，中華民國臺灣原住民同舟協會，2002 年。

叁、期刊與專書論文

朱宥勳，〈中心凹陷的歷史？——林耀德《一九四七高砂百合》的歷史與敘事結構〉，《文訊》339（2014 年），頁 89-91。

吳叡人，〈「臺灣高山族殺人事件」——高一生、湯守仁、林瑞昌事件之政治史的初步重建〉，收於《二二八事件 60 週年紀念論文集》。臺北：臺北市文化局、臺北二二八紀念館，2008 年，頁 325-363。

吳叡人，〈臺灣原住民自治主義的意識型態根源：樂信・瓦旦與吾雍・雅達烏猶卡那政治思想初探〉，收入洪麗完主編，《國家與原住民：亞太地區族群歷史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9 年，頁 193-229。

李喬，〈二七部隊與臺中人挺身反抗的歷史意義〉，收錄於李喬等撰，楊翠主編，《青春二二八：二七部隊的抵抗、挫折與流轉》。臺北：二二八基金會，2017 年，頁 3-13。

林瓊華，〈背叛與沉冤的辯證：關於謝雪紅離開二七部隊的歷史問題〉，收錄於李喬等撰，楊翠主編，《青春二二八：二七部隊的抵抗、挫折與流轉》，頁 17-71。

范燕秋，〈樂信・瓦旦與二二八事件中泰雅族的動態——探尋戰後初期臺灣原住民菁英的政治實踐〉，收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編，《二二八事件 60 週年紀念論文集》。臺北：臺北市文化局，2008 年，頁 365-391。

陳中禹，〈二二八事件中原住民族群動態與形象轉變〉，發表於「新史料與二二八研究學術研討會」（2013 年 11 月 29 日至 30 日），頁 1-29。

廖繼思，〈臺灣士紳廖德聰的履歷書〉，《臺灣風物》61：2（2011 年 6 月），頁 9-29。

鄭恆雄，〈林耀德《1947 高砂百合》的歷史神話符號系統〉，《中外文學》26：8（1998 年 1 月），頁 120-155。

蘇瑞鏘，〈二七部隊人物初探——以二二八事件後的政治抉擇為中心〉，收錄於李喬等撰，楊翠主編，《青春二二八：二七部隊的抵抗、挫折與流轉》，頁 103-151。

詹宜穎，〈論李喬《埋冤一九四七埋冤》與林耀德《一九四七高砂百合》中「日本」的書寫及其意義〉，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11：1（2017 年 3 月），頁 82-100。

肆、公報、報紙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公報》36：春：26（1947 年 2 月 1 日）。

〈臺中市連日情況 市區秩序已恢復〉，《臺灣新生報》（1947 年 3 月 6 日），第二版。

范燕秋，〈淪亡於二二八的原住民英靈〉，《自由時報》（1992 年 2 月 26 日），第 4 頁。

伍、其他

「臺灣大百科全書：西螺大橋條目」：<https://reurl.cc/Xe4QA0>（2021 年 1 月 29 日瀏覽）

陳慧先訪問，鍾逸人先生口述，2017 年 3 月 18 日臺中市新文化協會舉辦之「『二七部隊』紀錄片放映暨座談會」會後，地點：二二八國家紀念館。

陳慧先訪問，高英傑先生口述，2021 年 2 月 25 日於「原住民族與二二八」學術研討會，地點：國史館。

陳慧先，〈Tado Nawi（高信昭）先生口訪紀錄〉，訪問時間：2021 年 11 月 1 日，地點：Tado Nawi 先生清流部落宅。

Involvement of Taiwanese Indigenous Peoples in the 228 Incident in the light of the 27 Brigade

Chen Huei-hsien *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involvement of Taiwanese indigenous peoples in the area around the 27 Brigade operations during the 228 Incident. It aims to understand why there were rumors about “backing from the Wushe (or Musha) “Savage Tribe” in Taichung, and why some 27 Brigade members chose to seek help from the Wushe locals. Thanks to oral testimonies, it offers a perspective of indigenous peoples that has not received enough attention so far, as well as a more vivid picture of them during the Incident.

The 27 Brigade in Taichung adopted a resistance approach during the 228 Incident, which may explain why eventually an indiscriminate massacre did not take place in Taichung City. According to official sources, more than one hundred indigenous people participated in the uproar in Taichung City – it was even pointed out that they came from Wushe. However, it is more likely that they were members of the “Puli Team”, sent from the Nenggao District of Puli. Probably due to three reasons that they were misidentified: first, the Puli Team entered Taichung City at a time very close to when the 27 Brigade leader Chung I-jen first asked for help from Wushe; second,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ung-Hsing University.

the Puli Team was composed mainly of Pingpu peoples (or Plains indigenous peoples) with similar appearance; and finally, there were indeed some Wushe or Qingliu (or Alan Gluban) locals involved.

There are different reasons why this key figure of the 27 Brigade appealed to Wushe in the first place: In addition to geographical proximity, historical memory could have played a role — former members of the Taiwanese Communist Party may have had the idea of seeking cooperation and support from Taiwanese indigenous peoples since the Musha Incident. Although the 27 Brigade received no positive responses from Wushe, Seediq people from this area and those who had moved to Chuanzhongdao She (or Kawanakajima Tribe) did take part in the 228 Incident, some actively engaged while others passively affected. Other indigenous peoples involved, whether actively or passively, include students from various ethnic groups studying in Taichung at that time

Keywords : 27 Brigade, Taiwanese Indigenous Peoples, Wushe (Musha), Hsieh Hsueh-hung, Kao Tsung-i, Liao Te-tsung